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

第二册

〔埃及〕艾哈迈德·爱敏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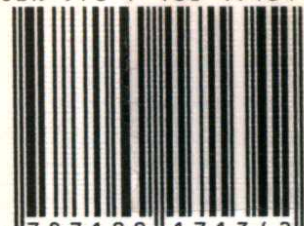


<http://www.cp.com.cn>



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

ISBN 978-7-100-17134-2



9 787100 171342 >

定价：46.00 元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

第二册

近午时期（一）

〔埃及〕艾哈迈德·爱敏 著

朱凯 史希同 译

纳忠 审校



商务印书馆

2019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. 第2册/(埃及)艾哈迈德·爱敏
著;朱凯,史希同译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9

(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7134 - 2

I. ①阿… II. ①艾…②朱…③史… III. ①文化史—
西亚 IV. ①K370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7000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

第二册

近午时期(一)

[埃及]艾哈迈德·爱敏 著

朱凯 史希同 译

纳忠 审校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7134 - 2

2019年10月第1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4½

定价:46.00元

فتح الإسلام

كتاب على طراز فجر الإسلام ، يبعث جزوه هلا في الحياة الاجتماعية
والتقافات المختلفة في العصر العباسي الأول

تأليف

أحمد أمين

الجزء الأول

本书根据黎巴嫩阿拉伯图书出版社第十版译出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出版说明

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。从五十年代起,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,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。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,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。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,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。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,为学人所熟知,毋需赘述。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,难见系统,汇编为丛书,才能相得益彰,蔚为大观,既便于研读查考,又利于文化积累。为此,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。现继续编印第九辑。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七种。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。由于采用原纸型,译文未能重新校订,体例也不完全统一,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,都一仍其旧,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。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,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,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,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。希望海内外读书界、著译界给我们批评、建议,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00年6月

审校者序言

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》八册本的主要内容,已在第一册“译者序言”中作了简要的介绍,本文仅就“近午时期”三册(即全书第二、三、四册)内容中两个重要问题,加以介绍。

百年翻译运动

公元八世纪中叶,阿拔斯王朝建立后,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基本停止,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。随着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,文化生活也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,阿拉伯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。因此,阿拔斯封建统治阶级,迫切希望汲取先进文化,希望把波斯、印度、希腊、罗马……的古代学术遗产译为阿拉伯语,以满足帝国各方面的需要。

哈里发王朝首先关心波斯古籍的翻译。因为阿拔斯家族推翻倭马亚王朝,建立自己的王朝,主要依靠以艾布·穆斯林为首的波斯人的力量。因此,波斯人大受重用。初期八十年内,七代哈里发时代的军政大权几乎都掌握在波斯人的手中,学术文化也向着“阿拉伯波斯文化”的方向发展。波斯籍的文人学者,一方面希望青云直上,猎取高官厚禄;一方面怀有民族情绪,力图宣扬波斯文化,以

提高自己的地位。他们争先恐后地学习阿拉伯语,对翻译波斯典籍也颇感兴趣。另外,阿拔斯新都巴格达位于旧波斯萨珊王朝首都泰息丰附近。泰息丰在萨珊王朝立国的四百余年,曾经是波斯文化的中心,这对阿拔斯王朝初期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。

在阿拔斯王朝初期,波斯萨珊王朝时代的古籍大部分已译为阿拉伯文。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波斯籍翻译家首推伊本·穆加发(公元727年卒),曾译《波斯诸王史》,成为历史学家塔巴里编著历史巨著《先知与帝王历史》的根据。又译《阿伊拿玛》,是一部记载波斯历代风俗习尚与法律的著作,约一千余页。穆加发最重要的翻译是《卡里莱和迪木乃》,又名《印度寓言》,以及马兹达教派的宗教著作《王冠》。阿拔斯初期所译的波斯著作,多半是文学与历史。有一本民间传说,名《千篇故事》,为后来《一千零一夜》的蓝本。进入公元九世纪后,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《阿味斯塔》及其注释《僧达味斯达》已译为阿拉伯文。阿拔斯王朝初期,阿拉伯人兼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者很多。其中专门从事波斯文的研究,同时又用阿拉伯文写诗著文者,也不乏其人。但其文笔与思维,处处带有浓厚的波斯色彩。

不少波斯学者,既精通波斯文,又通晓阿拉伯文。他们将古代波斯文学——诗歌、散文、故事、寓言……译为阿拉伯文。自己也用纯正而优美的阿拉伯文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散文。其中伊本·穆加发为阿拉伯散文开了一个新时代,成为阿拉伯散文的鼻祖。又如公元九世纪中叶的母撒·雅撒尔开设讲座时,右边坐阿拉伯学生,左边坐波斯学生;他分别用阿、波两种语言讲课和答辩。出自

其门墙的学者,既学会了阿拉伯语丰富而优美的词章,又掌握了波斯人深刻而隽永的哲理。这是阿拉伯人前所未有的,也是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。

波斯自古产生逍遥派和自然派的诗人,清谈豪饮,沉浸享乐。上自王公大臣,下至中上之家,大都半天作乐,半天工作。歌姬艺人带着各种歌唱、各种舞蹈,到各个城市和各个村镇。阿拉伯人统治波斯后,特别是阿拔斯王朝前期(公元750—844年),从半岛大量移民到波斯后,阿拉伯人多和波斯人聚居。他们走出帐幕,离开那单调的、粗放的游牧生活,来到繁荣富庶的“新土地”上,很快习染上这种奢侈放荡的生活。因此,阿拔斯王朝前期的歌艺最盛,歌姬舞女又多为波斯人。巴格达原为波斯旧地,阿拔斯王朝特别重用波斯人,沿袭波斯旧制,接受波斯文化的影响极深。巴格达皇宫中,歌女如云,笙歌达旦,真是“仙乐风飘处处闻”了。《一千零一夜》中描写的巴格达,就是波斯情调的巴格达。盲诗人巴沙尔(公元696—783年)是当时巴格达情诗和酒诗大王,善于用阿拉伯文写出波斯情调的诗歌。又喜欢在他的家里招致男女青年,听他弹琴歌唱。青年男女大受其影响。社会风气较百年前有极大的变化。这个时期的阿拉伯诗歌,充满了过去波斯诗歌的情调,大多是风花雪月、谈情说爱、歌咏酒事的篇章。

伊斯兰兴起前,阿拉伯人本来住在无垠的广漠里,映入眼帘者,无非是如火如荼的骄阳、密语的群星、悠悠的明月、狂舞的风儿。沙漠里似乎有一种自然的音乐——单调而凄惨、雄壮而威严的音乐。诗人发出来的言语,自然成为单调不变的诗歌。他们也有酒诗、有爱情诗,但所歌咏的事物,不外骆驼、羚羊、红花、美

女……之类的日常事物。当然也常歌颂爱情，缅怀逝去的佳偶。但歌词含蓄而朴素，不似阿拔斯时代的诗歌那样放荡不羁。例如伊斯兰以前歌咏两个情人的诗，有这样的句子：

共乘驼轿，情语绵绵；
驼鞍有情，左右款摆。

——伊姆拉·盖斯

阿拔斯时代的情诗却大不相同了：

小眠之后，黑夜将我俩聚在一起，
一颗心儿紧贴住另一颗心，
我俩同度春宵。
如将杯酒浇注我俩紧贴的心间，
也不会漏下一滴到地上。

……

——艾布·努瓦斯(公元762—813年)

以遁世思想寓于诗歌，这也是从阿拔斯朝兴起的：

你们生是为了死，
你们建筑是为了毁灭——
你们人人必将毁灭。
为什么建筑？
我们每人都将化为尘土，
都将化为原来的一抔尘土。
死亡呀，不可避免的死亡。
死吧！我并不留恋这今生。

* * *

我忙忙碌碌地寻找你呀，红尘！

我没有找到什么，

只是烦恼、忧愁、苦闷。

——艾布·阿塔希叶(公元 750—825 年)

这一类表达厌世思想的诗歌，在伊斯兰兴起前后，并没有这样表露无遗，因为贝都因人很少厌世的诗歌；而伊斯兰教则重视人生，反对弃绝现实，反对出家修行。因此伊斯兰初期没有修道院，没有出家的修士与修女。上面提到的阿塔希叶的诗歌，无疑是深受波斯摩尼教影响的，也是往后苏菲派(神秘派)诗歌的来源。此类诗歌，在阿拔斯王朝时代，和风情诗歌并行，风靡一时。

* * *

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接触，早在伊斯兰之前。古代印度和西方的交往，多经过阿拉伯地区，由印度洋扬帆西行，到阿拉伯半岛南部，或从亚丁湾进入红海，直达红海北端的伊勒(亚喀巴)，再经埃及陆路入地中海。或取道阿拉伯半岛的西海岸，经汉志地区，直达沙姆西岸海港，入地中海转西方。印度的宝石、刀剑、香料，早为阿拉伯人所称道，并见诸古代诗歌。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，准备进攻印度。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(公元 644—656 年在位)曾派人往印度察访。结果认为水源不足，果实稀少，盗贼横行，社会混乱；驻军少必失败，驻军多则缺粮，因而取消进军计划。过了半个世纪，到了倭马亚王朝瓦立德一世执政时代(公元 705—715 年)，派大将嘎西姆进攻印度，印度西北部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版图。从此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发生了更加密切的关系，特别是在宗教文化上发生了交流：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传入印度，而印度文化亦进入阿拉伯帝

国,主要发生于阿拔斯王朝时代。

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直接的和间接的。商业的交通、政治的统治、印度学者和阿拉伯学者来来往往,接触很多,这是直接的影响。波斯和印度相毗连,波斯受印度的文化影响极深。印度的许多古籍被译为波斯文,然后再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,这是间接的影响。如前面提到的《卡里莱和迪木乃》(《印度寓言》)和《一千零一夜》中的部分故事,便都是间接从波斯文译为阿拉伯文的。

阿拉伯人接受印度文化的东西很多,首先为哲学、宗教,还有数学与天文。阿拉伯人原来索居广漠,游牧为生。白天酷热,活动多在夜间和早、晚。万里黄沙,东西莫辨,全靠观察星象来指引方向。伊斯兰教兴起后,各地穆斯林每天按时做五次礼拜时,必须面对麦加克尔白(天房),白天靠太阳,夜晚察星位,才能确定克尔白方向。因此,穆斯林十分重视星象学。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便是一个星象学家,喜欢接近波斯和印度的星象学家,和他们谈论天象学问。公元770—771年,有一位印度星象学家,往见曼苏尔,并提交了一篇有关天文数理的论文,叫做《信德罕德》,论述诸星运行的规律。曼苏尔命法撒利译为阿拉伯文。这本天文学著作,在阿拉伯天文学界流行了五十年之久。到了第七代哈里发表蒙(公元813—833年)的末年,才开始研究托勒密的著作。印度天文学和数学,启发了阿拉伯人对这两门学问的浓厚兴趣,进而翻译了托勒密和欧几里得的著作,并作了极其深入的研究,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,如巴塔尼、比鲁尼、花刺子密……对天文学和数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。如今流行于世界的“阿拉伯

数字”，就是印度人发明的。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这种数字，然后又传入西方。因此，阿拉伯人称之为“印度数字”，西方人则称之为“阿拉伯数字”。现在世界通用的“零”的符号，也是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后传到西方的。“零”的符号在印度原为“点”(·)，传入西方后改为“圈”(0)。可是至今阿拉伯人仍使用(·)。足见印度文化对阿拉伯文化影响之深。

另一种影响是文学。伊斯兰教兴起前，阿拉伯人和印度交易的时期，印度语中的术语被转为阿拉伯语者很多。《古兰经》里有不少印度词汇，如姜、麝香、胡椒……都是印度产物，阿拉伯不生产这些东西，自然不可能有这类词汇，只能将印度词汇音译过去，时间久了便演变成为阿拉伯词汇。阿拉伯语的修辞学也受印度文修辞的影响。有一本论演说的印度著作，被译为阿拉伯语。书中有一段文章说：“演说家应特别注意修辞。演说家修辞的要点首为心神宁定，态度端庄，忌冗词，戒蔓语。演说的人必须注重自己的身份，官员不用市井俗语，国王不用街场俗话。不必咬文嚼字，不必太过典雅，除非听众是文人学士。”后来阿拉伯文章重视修辞学，这无疑多少受了印度语的影响。

印度的故事小说颇为丰富，阿拉伯人极其欣赏。著名的《印度寓言》(《卡里莱和迪木乃》)以及《水手辛底巴德游记》等都是来源于印度的。伊本·奈迪姆在他的学术名著《目录大全》中，列举了许多被译为阿拉伯语的印度故事。

阿拉伯文学受印度影响最深者莫如寓言、谚语、格言等。这些东西言简意赅，是由大众的经验、阅历形成的。类似文学，又不似文学作品那样畅达，但却言简易懂，很适合阿拉伯人的民族性，容

易接受,容易流传。如:“不使用的金钱等于陋币”、“不助人的朋友就是坏友”、“令人畏惧的君王是为昏君”、“不生产的土地是为瘠地”。又如:“有三件事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,即:君王施仁政、泛海经商、抗拒敌人。”这一类谚语和格言从印度传入阿拉伯。经过融合、充实丰富后,发展成为阿拉伯文苑中的琪花瑶草。

* * *

公元九世纪,阿拔斯人和拜占庭的关系有所缓和。交通畅通,商旅发达,国库充实,翻译事业有了政治和经济基础。翻译希腊古籍的事业极为繁荣。到了第七代哈里发麦蒙时代,译书事业达到顶峰,蔚为中世纪著名的“翻译运动”。在麦蒙的提倡、鼓励和支持下,穆斯林学者,以及阿拔斯王朝治下的非穆斯林学者争赴君士坦丁堡、塞浦路斯等地,搜集古籍。麦蒙本人和拜占庭皇帝之间,有了密切的联系。麦蒙写信给这位皇帝,要求允许巴格达派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去搜求古籍,并请求协助。麦蒙的要求得到允许,于是麦蒙派遣哈查吉·本·玛它尔和伊本·巴图力格前往。麦蒙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学术机构,称为“智慧宫”。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,运到巴格达,收藏在“智慧宫”。于是巴格达成为汇集古典文化遗产的宝库。据说大学者约翰·本·马赛维也到过君士坦丁堡。麦蒙还命沙克尔的三个儿子:穆罕默德、艾哈迈德和侯赛因等翻译希腊古典名著为阿拉伯文。接着麦蒙派大翻译家侯奈因率领另一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求书,带回大批稀世珍本;接着即着手翻译。

麦蒙本人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,特别爱好古希腊哲学,诸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,一旦译为阿拉伯文,他总是

以先读为快。据伊本·奈迪姆在《目录大全》中的记载,麦蒙夜梦一人,容光焕发,红须、宽额、碧眼,和蔼可亲,走到麦蒙床沿坐下。麦蒙非常严肃地问他:“你是何人?”答:“我是亚里士多德。”这可能是附会之说。可是麦蒙迷恋希腊哲学,熟读亚里士多德的书,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入睡后,在梦中有所反映,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始于倭马亚王朝,不过倭马亚王朝时代的译书,多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个人事业,零星翻译,没有计划。到了阿拔斯前期,译书成为国家的一项主要事业,有领导、有计划地进行。国家投入巨资,建立机构,组织人力,从各地延聘大批翻译家,专职进行,在精神上、物质上有优厚的待遇。翻译的范围极为广泛。

“智慧宫”中的图书馆、研究院和翻译馆,是继被焚毁了的“亚历山大图书馆”之后,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。麦蒙命叶海亚·马赛维主持“智慧宫”。翻译馆里有两位大翻译家,一个是侯奈因·本·易司哈格,一个是萨比特·本·古赖。侯奈因出身奴隶,为沙姆聂斯托列派的基督教徒。自幼好学,曾到巴格达投身于约翰·本·马赛维的门下学习。后从大医学家兼药物家加布里埃尔当学徒。学成后,哈里发麦蒙召他去主持“智慧宫”。侯奈因把大量希腊古籍译为阿拉伯语和沙姆语。亚里士多德的几十部著作,几乎全是他一手翻译的;一部分直接译为阿拉伯文,大部分则是先从希腊文译为沙姆文,再由其助手译为阿拉伯文。侯奈因卒于公元873年。根据伊本·奈迪姆在《目录大全》中的记载:侯奈因精通沙姆文、希腊文和阿拉伯文,曾访问过拜占庭与塞浦路斯各

国,遍读群书,搜寻古籍。萨比特·本·古赖,生于公元835年,卒于公元901年。原为希拉城的萨比教徒,后到巴格达从事翻译工作。主要译希腊数学和天文学。麦蒙创建的“智慧宫”(一说是拉希德创建,麦蒙扩建)在公元九世纪的一百年内,兴盛不衰。阿拔斯前期留下来的极为丰富的翻译典籍,为后期极盛时代的学术文化的创造发展,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影响。

此外,早在倭马亚王朝时代出现的各个伊斯兰教派,到了阿拔斯王朝,变得更为复杂。本书第四册(近午时期卷三)有详细的阐述。

学术文化的记录与编纂

阿拔斯王朝前期,教育事业极其发达。大城市,特别是首都巴格达,清真寺成为传授知识的教育场所。著名学者都在清真寺开设讲座。并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,各派学者到会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,进而互相辩论。例如穆阿台及勒派的创始人瓦绥勒,开始参加他的老师哈桑·巴士里的讲座授业,后来他和老师的某些学术观点持不同看法,师生发生辩论,无法取得一致。最后瓦绥勒终于离开老师的讲座,自己到大寺的另一隅,自创学派,招授门徒,和老师对立,故这个学派又称为“分离派”。足见当时讲学的优良风气。

清真寺不仅讲授语法学、圣训学、法律学、教义学、哲学,也讲授自然科学。这种自由学风,颇受哈里发的支持和鼓励。哈里发自己多延聘著名的学者,为诸子的太傅。

教育事业多半是私人自由举办的,国家很少提供经费,国家预

算中亦无教育经费一项,仅由哈里发和大臣们向学者馈赠。因此,国家既不设置也不干预教学纲领,除非讲授内容背叛伊斯兰的基本精神。教育大门向任何人敞开。清真寺里倚柱而设立的半圆圈讲座,虽平民百姓、贩夫走卒,亦能自由听讲、质询和辩论。因此,阿拔斯王朝前期,涌现出大量出自寒门的学者。如平民诗人艾布·阿塔希叶原是陶器工人;大诗人艾布·泰玛姆乃一背着水囊沿街叫卖的水贩;著名法学家、大法官艾布·尤苏福原是陶器工人。

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旅行蔚然成风,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,当然这和政治局势之安定、生活条件之丰裕是分不开的。学者们除到东西方的通都大邑互访外,还到穷乡僻壤和游牧地区访问,汲取纯洁的语言,搜集朴实的文学素材。圣训学者到各地搜集圣训,历史学家征集史料,地理学家察访河海道里。自从哈里发麦蒙与拜占庭的关系得到缓和后,麦蒙曾派遣侯奈因组织学术访问团,访问君士坦丁堡,请求拜占庭皇帝代为搜集希腊古籍,从而掀起了翻译希腊古籍的百年“翻译运动”。

公元九世纪上半叶,记录抄写古籍与传说之风,大为盛行。记录下来的阿拉伯古代传说,大半为诗歌、寓言与散文。这里应当阐述一下推动记录古代文化遗产的因素:

在阿拔斯前期,“新穆斯林”(麦瓦里)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,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有文化的阿拉伯人,不会满足,甚至不会轻信流行了数百年的口头传述,不论是诗歌散文,或是历史故事,特别是关于“圣训”以及圣战的传说。他们迫切需要获得更可靠的资料。